

■ 于雪棠 / 著

『周易』

与中国上古文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ZHOUYI YU ZHONGGUO SHANGGU WENXUE

《周易》与中国上古文学

于雪棠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易》与中国上古文学/于雪棠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8

ISBN 7-303-06500-8

I. 周… II. 于… III. 周易—影响—古典文学—中国—上古 IV. ①B221②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99597 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http://www.bnup.com.cn>

出版人: 赖德胜

北京东方圣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148mm × 210mm 印张: 7 字数: 188 千字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定价: 12.00 元

序

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历程中，从来都是泛文学与纯文学并存，很难把二者截然分开。二者之间血脉相通、共存互动，由此形成中国古代文学鲜明的民族特色。中国古代泛文学杂糅共存，由此决定了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既可以专门关注纯文学，也可以把泛文学作为对象。两种研究方式各有所长，没有高下之分。即以中国古代两部最早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诗品》和《文心雕龙》而言，前者是纯文学的，后者是泛文学的，尽管它们所出现的自然分工是如此明确，但却是各有千秋，都是文学批评史上垂范后世的不朽之作。

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可以把纯文学作为对象，也可以把泛文学作为对象。不过，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来说，无论是研究纯文学还是泛文学，都必须具备相应的古代文学素养，能够兼通经史，否则，就会举步维艰，或者是陷入无法继续开拓的困境。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绝大多数接受的都是现代教育，在国学功底方面已经根本无法与前代学者相比，因此，如何解决好古代文学研究中兼通经史的问题，成为深化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对此，当代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可以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从事研究之初就在大文化背景下对古代文学进行审视，把经史作为从事研究的坚实基础，把文学研究和经史相贯通。这种研究方法的优长之处是功底扎实，在面对具体问题时能够融会贯通，思维具有较强的穿透力，能够在文学之外找到解决文学问题的途径和方法。这种从大文化背景下研究古代文学的方式也很容易产生流弊，如果分寸把握得不当，往往用文化的批评代替或冲淡文学的研究，甚至在大文化的背景中往而不返，入而不出，从而丧失研究的文学本位。另

外，把文学和经史相沟通是一项艰难的工作，需要有较长的周期，不能期待很快就推出创造性的结果。这在当今人心浮躁、物欲横流的时代，真正付诸实行需要有坚忍不拔的毅力，必须真正养成学术上的定力。把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古代经史相沟通还有另一种方式，那就是先从中国古代文学本身切入，尤其是紧紧围绕文本解读这个中心，然后依次向外扩展，由文本而涉及到作家生平、时代风尚、历史传统等，并且在适当时机由文学扩展到经史，和传统文化相沟通。这是一条比较稳妥的路，许多学者都是从这条路上走过来的，有的正在朝这条路上走。它的长处是可以牢牢把握文学本位，不易出现偏离文学研究的现象。同时，由于对文学本身有较多的了解，所以，在把文学研究和经史相沟通、和大文化背景相联系的时候针对性更强，盲目性较少，毋庸讳言，这种研究方式有时也容易出现局限。由于都是针对文学上的具体问题去研读经史，往往对大的文化背景缺少准确的把握，甚至出现误解或片面性。

雪棠博士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熏陶，后来又受到系统的专业训练，培养起对中国古代文学浓厚的兴趣，并且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在她走向学术研究之路以前，就已经阅读了大量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并且赋诗填词、作文写赋，积累了古典诗文创作的经验。在她走上学术研究之路的初始阶段，首先接触的不是纯粹的文学作品，而是系统研读《周易》、《礼记》、《论语》、《老子》、《庄子》这些经典著作。由于雪棠博士以往良好的文学功底，所以，她很快就熟悉了在大文化背景下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思路和方法，并相继推出系列论文。她的研究兼有上述两种方式的特长，既有大文化的开阔视野，又能坚持文学本位，把研读经史的心得融会到文学作品的解读之中，收到良好的效果。她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多篇论文，展示了这位年轻学子不断探索，不断超越自己的学术历程。

雪棠的博士论文主要探讨《周易》和先秦两汉文学的关系，这是一个艰深的题目，带有较大风险，她的选择显示出可贵的学术勇气和自信心。《周易》作为重要的经学著作，历来在哲学、政治方面备受关注，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又把对它的研究伸展到历史和民

俗领域。至于《周易》的文学研究，一直是薄弱环节。虽然高亨等前辈学者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已经开始发掘《周易》的文学价值，但基本上限于把《周易》的卦爻辞和《诗经》的比兴相对照。进入新时期以后，《周易》和文学的联系得到普遍关注，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但是，相比较而言，古代文论在这方面的研究明显领先于古代文学，古代文学在这个领域尚未取得明显的突破。

回顾以往有关《周易》与中国古代文学关系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停留于具体问题的论述，而缺乏全面的梳理和整体观照，因此缺乏必要的深度和系统的理论。雪棠的博士论文对先哲时贤的已有研究成果广采博收，同时又进一步开拓新的领域，最终形成宏伟的框架和完整的体系。她不但把《周易》的某些意象和《诗经》的比兴相对照，而且还从思维方式上把握《周易》的总体特征；她不但展示由《周易》派生的文本形态，同时还梳理由《周易》思维张力所形成的文本内部结构。她的研究是宏观的、整体性的，同时又不乏具体问题的深入探讨。从个别卦的系统解读，到某些浓缩型意象的深入发掘，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尤其可贵的是，她始终坚持文学本位，无论理论上引申多远，文化背景方面展示得如何开阔，最后都回归到文学本位，落实到文本解读上。在这部即将出版的著作中，她充分利用以往丰富的知识储备，虽然探讨的重点是《周易》与先秦两汉文学的关系，但又不局限于先秦两汉文学，而是伸展到后来的许多文学作品中。愚以为，先秦阶段是中国古代文学原型生成期，中古阶段是文学范型确立期。与此相应，中国古代文学，从上古到中古经历了由严峻风格到理想风格的演变。雪棠博士的这部著作，对于深入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上述转变富有启示意义。

雪棠从1996年开始攻读我的博士研究生，在此之前我们就已经有过学术交流。如果从我们研究她的第一篇论文算起，如今已有十年之久。在她攻读博士期间，我们曾经逐字逐句研读《周易》本经。当时由于我的考虑不周，对《周易》爻辞采用的是分爻位讲解的方式，而不是逐卦推移。采取这种研读方式的初衷是为了把握爻位相对稳定的象征意义，但往往妨碍对各卦的总体把握，对一卦之

内爻辞的连贯性注意得不够。另外，雪棠攻读博士期间，我正勉为其难地在东北师大忝列系主任之位，杂务困扰，分身乏术，因此，对她的指导往往力不从心，有时甚至捉襟见肘。现在回想起来，实在是两件遗憾的事。好在雪棠博士刻苦自学，奋发不息，已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由于我的指导不力而造成的缺陷。

前几年，雪棠博士在师从郭英德先生进入博士后流动站工作期间，又在英德先生指点下系统研究《尚书》与中国古代文体的关系，收获颇多。《周易》、《尚书》在古代经典中极为重要，但却是最难解读的两部著作。雪棠博士对这两部经典都有深入的研究和全面的把握，基础更加宽广和深厚，从而为今后的学术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如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索，一定会再创辉煌，并且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

光阴似箭，岁月悠悠，十载时光弹指而过。雪棠博士已由清纯学子，成为世纪之初的学术新人。相信雪棠会在学术上变得更加成熟，更有创造力，她的学术会和她最有活力的年龄一样，永远焕发着青春的活力。

新年伊始，提笔为雪棠博士即将出版的著作写序，这当是今年的第一件乐事。

李炳海

2005年元旦于中国人民大学林园寓所

目 录

序	(1)
引言	(1)
第一章 《周易》的价值取向与上古文学主题的生成	(11)
第一节 《周易》与上古文学狩猎主题	(11)
一、原始与文明的交织	(11)
二、农业文明与游牧文化的交汇	(17)
三、个体与群体的兼顾及冲突	(22)
第二节 《周易》与上古文学安土重迁主题	(26)
一、《周易》安土重迁主题	(26)
二、《诗经》生命意识的觉醒	(31)
三、儒道两家对安土重迁的超越	(34)
第三节 《周易》与上古文学用舍行藏主题	(37)
一、忧患意识与旷达的人生哲学	(38)
二、旷达洒脱的艺术群像	(43)
三、用舍行藏观念及艺术表现	(49)
四、汉赋的伤时叹命与委运安命	(57)
第四节 《周易》与《左传》的变革主题	(61)
一、君臣关系的转变	(62)
二、公室卑弱与个人命运	(66)
三、持盈难久的多元形态	(68)
四、兴衰之变的时限预言	(74)
五、两种相反的转变契机	(80)
六、巫术文本与文学形式	(83)

七、变革的原因与时机	(85)
八、《易》理与变革者的命运	(91)
第二章 《周易》的结构模式与上古文学的框架体制	(95)
第一节 《周易》爻辞与三句体诗结构模式	(95)
一、叙事与抒情	(95)
二、几种结构方式	(100)
三、“三”的意义	(103)
第二节 《周易·坤》卦七爻与《庄子》内篇	(105)
一、《庄子》内篇六段成章的结构模式	(105)
二、《坤》卦与《庄子》内篇主旨的相通	(106)
三、余论	(112)
第三节 《周易》的占问与上古文学的问对体	(113)
一、有关问对体的几种意见	(114)
二、巫卜与问对体文本的产生	(116)
三、《周易》与问对体结构模式	(119)
四、《周易》与问对体的内蕴	(125)
第四节 《周易》结构与战国秦汉散文的体制	(132)
一、对卦式结构形态	(133)
二、包举宇宙式结构	(138)
三、序在书末的体例	(142)
四、经传合编与论说文	(146)
第三章 《周易》的典型意象与上古文学的艺术原型	(151)
第一节 《周易》马龙原型与上古文学的相关意象	(151)
一、《周易》马原型及相关事象	(151)
二、《诗经》中的马意象	(156)
三、战国秦汉作品中人与马龙的生命一体化	(161)
第二节 《周易》羊牛意象与上古神话及文学表现	(168)
一、作为神灵和图腾的羊牛形象	(168)
二、《周易》中阳刚的象征	(170)
三、牵羊事象与神羊断狱	(172)

四、文学作品中羊牛意象的象征意蕴·····	(173)
第三节 《周易》鸿鸟原型及相关意象与上古文学 ·····	(176)
一、《渐》卦及诗文中鸿鸟意象的象征意蕴 ·····	(177)
二、鸿鸟意象及相关原型的情感特征·····	(184)
三、《周易》与诗歌表现方式的同异之辨 ·····	(188)
四、隐曲深婉的美学特征与秘响旁通的审美效果·····	(191)
第四节 《周易》棘石坎等刑狱意象与上古文学 ·····	(193)
一、《周易》的刑狱意象 ·····	(193)
二、相关《诗经》作品解读·····	(198)
三、楚辞与“困于幽谷”事象·····	(200)
四、坎狱意象与文化心理·····	(204)
参考文献·····	(207)
后记·····	(213)

引 言

《周易》是一处永远开采不尽的矿藏，更是一座闪耀着神奇的光芒，令人无限向往的宝山，那里涌流着智慧的甘泉，散发着哲思的芬芳，吸引着人们在语词的密林里艰难地跋涉，走向它，靠近它……

一

《周易》是古今显学，自先秦迄至明清，解经之书浩如烟海。约而言之，有“两派六宗”之说：

《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几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为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为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小序》）

两派之宗祖是指汉代的象数易与王弼的哲理易。汉代京房、焦延寿和宋代陈抟、邵雍是象数派的两大派别；胡、程的儒理易和李、杨的史学易为哲理派的两大派别。同时，《易》学研究又不局限于两派六宗：

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

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同上）

《易》本身涵盖深奥广大，这就使得从各种角度解说《易》成为可能。于是，一代又一代的易学研究者所涉及的领域惊人的宽广。

近代的《周易》研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颇为注重，创获甚多，相继推出一系列力作。较早从中西哲学比较方面探讨《周易》的当推牟宗三，他的《从周易方面研究中国之元学及道德哲学》1935年就已问世。而顾颉刚、胡朴安、郭沫若诸家则着重从历史角度审视《周易》，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卦爻辞史实的考证上^①。近十年来，海内外学者对《周易》哲学思想阐释尤为充分。对比之下，《周易》的文学研究显得相对薄弱，还有很大的开拓余地。

从文学角度研究《周易》，前人也有过一些论断。宋代陈骙把《易》与《诗》联系起来对文章的表现方法进行探讨，他说：“《易》之有象，以尽其意；《诗》之有比，以达其情。文之作也，可无喻乎？”（《文则》），清顾炎武、江有诰对《周易》用韵做了深入的研究，顾著有《易音》、江著有《易经韵读》。阮元论《文言》为“千古文章祖”（《研经室三集·文言说》），章学诚揭示了《易》之“象”与《诗》之“兴”的内在关联，并把《易》之象与战国之文的表现方式联系起来。他说：

《易》象虽包六艺，与《诗》之比兴尤为表里。夫《诗》之流别，盛于战国人文，所谓长于讽喻，不学《诗》无以言也。然战国之文，深于比兴，即其深于取象者也。

① 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古史辨》第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胡朴安：《周易古史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庄列之寓言也，则触蛮可以立国，蕉鹿可以听讼；《离骚》之抒愤也，则帝阙可上九天，鬼情可察九地；他若纵横驰骋之士，飞箝捭阖之流，徙蛇引虎之营谋，桃梗土偶之问答，愈出愈奇，不可思议。……此《易》教所以范天下也。（《文史通义·易教下》）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一些研究者以更为新颖的观点，把《周易》同我国古代文学的起源及对古代文论的影响联系起来，深入探讨《周易》的文学价值。李镜池先生对《周易》卦爻辞本身的文学性有所涉及，给人以很大的启发。他在《周易筮辞考》一文第四节“周易中的比兴诗歌”中指出：“‘比’与‘兴’这两种诗体，在《诗经》中是很多的，说诗的人自会依体解释。但《周易》中也有这类的诗歌，却从来没有人知道，更没有以说《诗》之法说《易》了。”^①他发现了《易经》一些古歌，详细分析了《明夷》初九和《中孚》九二两条爻辞。此外，他还列举了十九条爻辞，称之为“诗歌式的句子。”在他看来，“卦、爻辞中有两种体制不同的文字——散体的筮辞与韵文的诗歌。”

二十世纪中叶，郭沫若先生对爻辞的文学性亦有所涉及，他指出：“《经》文的《爻辞》多半是韵文，而且有不少是很有诗意的。”他共举了六条爻辞和一条彖辞为例^②。高亨先生就《周易》卦爻辞的文学价值做了专门的论述，他认为《周易》具有独特的体例，《周易》本是散文作品，其中竟包含不少短歌。散文夹杂韵文，也是以前所没有的、创造性的体例。这种体例，西周及东周的铜器铭文里时有出现；《周易》的《彖》、《象》、《系辞》以及《国语》、《老子》、《庄子》等书里更属多见。（不再举例）如果说这种体例导源于《周易》，是符合史实的。在表现手法和语言风格方面，《周易》具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周易》常用比喻的手法来指示人

① 《古史辨》第三册，1981。

②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49。

事的吉凶。二、《周易》带有相当浓厚的诗歌色彩。以《诗经》来作比较，他从四个方面举例阐述。1. 采用赋的手法的短歌。2. 采用比的手法的短歌。3. 采用兴的手法的短歌。4. 类似寓言的短歌。三、《周易》古经在语言方面的特点是词汇相当丰富；语句简短而洗练；描写事物，有些是生动有姿，形象性较强^①。高亨先生不仅看到《周易》体例的独创性，而且还把它与先秦散文的体例联系起来，认为《周易》是这种体例的源头，这就比李镜池先生的论断更进了一步。他对《周易》表现手法的阐释也比前人更加具体。钱钟书先生也曾就《易》之象与《诗》之象二者之间的差异做出过经典性的论断^②。

几位先生对《周易》本身的文学性及其与古代文学联系的发掘阐释上都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但后来的研究者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很少取得这方面的突破。近十年来，业师李炳海先生从文化学的角度切入，在对《易》与《诗》同源、同一意象在《易》与《诗》中的不同意蕴以及《易》卦爻辞寓言诗的编排方式等一系列问题上，独辟蹊径，有许多新的发现^③。黄玉顺先生出版了《易经古歌考释》一书^④，把每卦六条爻辞的相关内容串连起来，组成一首或两首歌谣，总共寻绎出六十八首歌辞。在对《周易》本身歌谣性的研究上，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跨越古代文学和《周易》两个领域的中青年学者张善文先生，相继出版了几本《周易》研究著作，其

① 高亨：《周易杂论》，济南，齐鲁书社，1979。

② 钱云：“《易》之有象，取譬明理也，‘所以喻道，而非道也’（语本《淮南子·说山训》）。……诗也者，有象之言，依象以成言；舍象忘言，是无诗矣，变象易言，是别为一诗甚且非诗矣。故《易》之拟象不即，指示意义之符（sign）也；《诗》之比喻不离，体示意义之迹（icon）也。不即者可以取代，不离者勿容更张。”（《管锥编》第二册，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③ 见《先秦诗歌史论》第三章“色彩神秘的《周易》卦爻辞”，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

④ 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成都，巴蜀书社，1995。

中,《周易与文学》一书^①,集结了作者十余年来研究有关中国古代文学与《周易》关系的论文,不仅深入探讨了《周易》经传本身的文学性,还进一步钩索出《周易》的思维方式与艺术思维的联系、《周易》所具有的美学意蕴、《周易》对《文心雕龙》的影响等等。作者视野开阔,把《周易》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提到更高的层次,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陈良运先生推出了《周易与中国文学》一书^②,侧重于《周易》与中国文学理论方面的研究。重点探讨了《周易》经传原始文本中所蕴含的文学原理、文学观念、审美意识、语言艺术诸种要素,力证《周易》的内容与形式,对中国古代早期文学创作与文学观念体系形成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周易》对中国文学发展的深远影响,包括人文精神、文学本原到创作、鉴赏等种种文学观念范畴的正式确立,理论构架的成型等内容。全书体系完整,构架宏阔,在许多问题的阐述上,都有使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二

《周易》研究史表明,从文学研究的角度,考察《周易》与先秦两汉文学、亦即中国上古文学错综复杂的多种关联,是一个很有开拓余地的学术领域。本书力图论证《周易》是中国古代文学重要的文化源头,从文学的角度揭示《周易》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奠基意义。

在进行梳理、考察《周易》与中国上古文学关系的问题之前,有些相关问题需要说明。一是关于《周易》的制作年代。只有确定了《周易》产生的时段,才可以展开具体的研究,否则,其源头的性质将无从谈起。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经文部分作于周初,传文部分

① 张善文:《周易与文学》,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

② 陈良运:《周易与中国古代文学》,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

作于战国中叶至晚期^①，本书采取了这种说法，研究工作是在这个背景下开始的。二是《周易》的经文和传文产生时代不同，传文最初单独刊行，直到魏时的王弼才开始把《彖》、《象》附于相应的卦爻辞之后，《文言》附于《乾》、《坤》两卦后，《系辞》、《说卦》、《序卦》、《杂卦》依次列在经文之后。这种经传合编的形式影响很大，传文的价值也逐渐提升到与经文相等的地位，人们在论及《周易》时，往往把经和传视为完整的一体。这种观念已经约定俗成，因而，本书所言《周易》总体上包括经和传两部分，在论述中不特别分开。但是经和传毕竟有所区别，因而，在论及具体问题时，会特别指明经文或传文。

本书重在挖掘《周易》与上古文学之间的多种关联。所谓上古

① 关于《周易》制作的年代，撮举几家之说如下：

《易·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

余永梁：“《卦爻辞》所纪史事皆在周初，最晚的事也只到康侯。……从上面史实推知《卦爻辞》作于成王时，大概可以说有些根据。”（《易卦爻辞的时代及其作者》，载于《古史辨》第三册，162页）

李镜池：“我们现在认为《周易》的编著，出于周王朝的卜史之官，成书年代约在西周晚期。”（《周易探源》，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8）

杨伯峻：“《卦辞》、《爻辞》作于西周初年。因为它所载的内容，有殷商祖先的故事，也有周代初年的史事，却没有夹杂后代的任何色彩。”“《彖传》，这篇写得最早”“它有不少用韵处，但《卦辞》、《爻辞》与《诗经》用韵不同，而接近于《楚辞》以及《老子》、《庄子》的用韵。以时代论，近于战国；以地域论，近于南方。”“《象传》之作在《论语》流行以后。……《象传》很大可能是战国中到晚期作品。”“《文言》……最早也不过战国晚期。”“《系辞》中有些话曾被汉初人所引用。……足见《系辞》作于西汉以前。”“《说卦》、《序卦》、《杂卦》三篇，写作更晚。三篇之中，《说卦》很可能较早。总之三篇或许在汉初，或许晚到汉宣帝。”（《经书浅谈》，10~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朱自清：“从卦爻辞里的历史故事和风俗制度看，我们知道这些是西周初叶的纪录。”（《经典常谈》，14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

文学，这里是广义的，材料来源主要是：《诗经》、《尚书》（《今文尚书》）、《春秋左氏传》、《国语》、《论语》、《孟子》、《老子》、《庄子》、《楚辞》、汉赋、汉诗、《史记》、《汉书》、《后汉书》、《说苑》。除了上述诸种，还重点参考、引证了《周礼》和《礼记》等礼学方面的典籍。

研究工作能够取得多大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采用的方法。不同时代的人们采用的方法不尽相同，解决的问题也各有侧重，每一种新视角的介入，总能给研究带来活力，使旧的研究对象焕发出新的光彩。研究对象就在新方法新视角的观照阐释下，获得了生生不息、万古常新的生命。进入本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大量译介了西方的各种方法论，这极大地激活了我国本土的学术研究。在这种时代学术氛围的影响下，本书采取以下几种方法。

1. 传统考据与现代解析相兼顾的方法。《周易》解读历来存在许多误区，还有不少语言障碍有待于进一步解决，还一直存在将《周易》神秘化的倾向。本书的研究注重利用古代典籍、出土文物和民族学、民俗学等方面的材料，真正还《周易》以历史本来面目，力求追索探索出经文卦爻辞原初的生活取象，在此基础上，再探求它与文学的关联，从而把本课题的研究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例如对《革》卦“己日乃革”内在意蕴的辨析上，就引证了相关的以六为一循环单位的观念，明确指出“己日”的特殊性在于它恰巧处于天干第六位。从而考察了古人对变革时机的认识和把握。再如对《明夷》六二和《涣》初六卦“用拯马壮”的理解，难点在于“拯”字的意思，经过考证，发现“拯”字具有一个不太常见的“收”的意思，从而考察出这个马意象的真正意蕴。

在解析《周易》时，还注意吸收现代科学的最新成果，借鉴西方的有关理论，如主题分析学、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神话—原型批评、文化人类学方法。在具体论述中，不同程度地参照了西方理论。例如对鸿鸟原型及相关意象的论述，就运用了荣格的原型理论，用以分析《周易》中水鸟原型所蕴含的欢乐与悲伤这两种人类基本的情感类型，及其在文学中的表现及流变。对上古时代“尚左